

詹镓全集

詹镓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詹锳全集 / 詹锳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545-2704-7

I. ①詹… II. ①詹…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9628号

书 名 詹锳全集
封面题签 袁行霈
主 编 詹福瑞 任文京
策 划 杨 才 张 辉
责任编辑 刘相美 何春雅 刘亚飞
文字校对 王 莉
特约编审 张圣洁
装帧设计 牛亚勋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2)
排 版 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9.5
字 数 2600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2704-7
定 价 760.00元(全六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詹鎔全集》卷册

卷一：《文心雕龙义证》上

卷二：《文心雕龙义证》中

卷三：《文心雕龙义证》下

卷四：《〈文心雕龙〉的风格学》

《刘勰与〈文心雕龙〉》

《唐诗》

卷五：《李白诗文系年》

《李白诗论丛》

《李白诗选译》

卷六：《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

《集外论文》

凡 例

一、《詹镬全集》收入詹镬先生有关《文心雕龙》和唐诗方面的如下论著：《文心雕龙义证》《刘勰与〈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和《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李白诗选译》《唐诗》；另收《语言文学和心理学论集》。詹镬先生散见于报刊杂志未经集结出版的论文，统编为《集外论文》，置于《全集》之末。

二、根据尊重原作的原则和古（旧）籍整理的一般规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本的风貌，对原著述的内容一般不予改动，原著述中对历史人物、著作的评述及其用语一仍其旧。

与同时代诸多专家一样，詹镬先生引书常有省略约减或个别词语的更动；只要不失原意，则不以所征引之书改动引文。

三、詹镬先生的著述，多为繁体字本，时间跨度有六十年之久，其间国家语言文字规范迭经变动；而各出版单位及编辑所掌握的尺度不一，水平亦有高下之别，故整理詹镬先生的《全集》时，我们主要以国务院2013年6月5日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和《辞海》（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等权威辞书为依据，对詹镬先生的著述做了统一处理。

（一）改繁体字、异体字为简化字、正体字，而对通假字、古今字和避讳字等则不予改动，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述的用字风貌。但在以下情况中，如改用简化字、正体字容易产生歧义的，则保留原繁体字、异体字。

1. 人名、地名、书名等专用名词。如孔子的母亲徵在，唐朝的魏徵，明朝的文徵明，“徵”不改为“征”；唐朝的刘知幾，“幾”不改为“几”；《汉书·何並传》，“並”不改为正体字“并”。《穀梁传》《遯斋闲览》《艺苑卮言》中的“穀”不改为“谷”，“遯”不改

为“遁”，“卮”不改为“卮”。

2. 《文心雕龙义证》注释中大量存在字形辨析问题，其中有必须保留繁体字、异体字者。如：“離雜形近致讹……是離雜相近易误之证。”如改“離”为“离”，改“雜”为“杂”，则二字就不存在“形近致讹”的问题了。再如《斟诠》：“並，正字作‘竝’，《说文》：‘竝，併也，从二立。’”如将“並竝併”这三个异体字统用正体字“并”，则不知所云了。

同此，《文心雕龙》中的“頌讚”篇、“體性”篇、“麗辭”篇中的“讚體麗”三字，也因存在字形辨析问题而不可改为简化字。

3. 根据1986年6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1964年5月至1986年10月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中，“叠、覆、像”简化为“迭、复、象”的，应恢复原繁体。如“重峦迭嶂”中“迭”，恢复为“叠”；“妾发初复额”的“复”，恢复为“覆”；“不象汉朝那样……”“象南朝诗人鲍照”，“象”恢复为“像”。以上均径改不出校记。

4. 1977年至1986年间的著述，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77年发表试行，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准废止）中的简化字，恢复原繁体。如“邦助”径改为“帮助”，“臆想”径改为“臆想”，均不出校记。

5. 《通用规范汉字表》发表前，一些姓氏、人名中的“鍾”字简化为“钟”的，恢复原繁体字的新简化字“鍾”。如“钟繇、钟嵘”改为“鍾繇、鍾嵘”。

6. 在某些特殊语境中需要保留繁体字、异体字者。如引《世说新语·简傲》提到吕安去探望嵇康，嵇康不在，其兄嵇喜“出户延之”。吕安“不入，题门下作‘鳳’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这个“鳳”字是由“凡鳥”二字合成，意在讽刺嵇喜是凡夫俗子，如改为简化字“凤”，则令人不解何意了。

（二）根据GB-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中的《新旧字形对照表》，将原著述中的旧字形改为新字形。如“煥”改为“焕”，“蛻”改为“蜕”，“瑤”改为“瑶”，“慍”改为

“愠”，“爭掙箠靜”改为“争挣箠静”，等等。

（三）根据2012年正式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对原著述中错用标点之处（如兼语前后误加点号、非疑问句句末使用问号等）予以改正。原著述中并列的专名，以下划线即专名号予以标示，而《全集》排印本取消了专名号，则须在并列的专名之间补加顿号，以示区分。如《文心雕龙义证》卷十：“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卿指司马长卿即司马相如，渊指王子渊即王褒，熊指扬雄，向指刘向。取消专名号后，在“卿渊”之间、“雄向”之间各加一顿号，表示顿号前后四个字均为人名。另，表并列关系的两个以上的书名号（《》）或引号（“”）之间，原用法往往用顿号隔开，兹据2012年《标点符号用法》，取消顿号。

四、其他技术处理问题

（一）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依据《辞海》的范式统一处理，如“天宝三载（744）”改为“天宝三载（744年）”。“孟浩然（公元689——740年）”改为“孟浩然（689——740）”，“元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改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

（二）各著述中的引文统一按缩格、变字体、上下空行的格式处理。

（三）《李白诗选译》中的诗歌照统一格式编排。

序 例

我于四十年代在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为诸生授《文心雕龙》，深感作者刘勰熟读群经，博览子史，于齐梁以前文集无不洞晓，而又深通内典，思想绵密。原书大量运用形象语言，说明极其复杂的抽象问题，许多句法都是化用古籍，非反复钻研难以探其奥义。至于其中所阐述的理论，就更加难以明其究竟。建国以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及文艺理论，对于《文心雕龙》始有更进一步的理解。近二十多年来，又曾先后为中文系教师和研究生讲授《文心雕龙》，对原书的理解逐步深入，因而有写《文心雕龙义证》之意。

通过几十年的摸索，我感到《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讲写作的书，《序志》篇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过去有人把《文心雕龙》当作论文章作法的书，也有人把《文心雕龙》当作讲修辞学的书，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部书的特点是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讲文章作法和修辞学，而作者的文艺理论又是从各体文章的写作和对各体文章代表作家作品的评论当中总结出来的。刘勰的批评标准是经书。他认为经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写作的楷模，所以他主张宗经。他提出要向圣人学习。《征圣》篇明确地说：“是以论文必征于圣，征圣必宗于经。”全书开宗明义在《原道》篇里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个“文”，主要是指经书的文辞。《正纬》篇则是根据经书来检验纬书，发现纬书有四个方面的伪托，而加以批判纠正的。至于《辨骚》，也是以经书为准绳，来辨别《楚辞》与《风》《雅》的四同四异，发现《楚辞》对《诗经》的《风》《雅》来说是有了变异的。《文心雕龙》中虽然也列了《史传》和《诸子》两个专篇，但在刘勰看来，史传之文和诸子之文，是不能与经书相比的。

如果从文学样式来说，无论经书、史书、子书，都不外乎诗文。不过刘勰并不把经书当作某一文体来看，而是尊之为“圣文”，认为经书是一切文体的本源。他只对经书以后的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进行评论，所以中国早期的文学评论就是诗文评。中国的目录学，于集部中特设诗文评一类，《文心雕龙》即是列为诗文评类之首的。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什么民族特点，它首先是以诗文评为主，其中的文这一大类并不限于文学作品，而是包括了大量的不具形象的应用文字的。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是从诗文中总结出来的，小说、戏曲比较后起。从《诗经》时代起，诗歌就是和音乐不可分割的。魏晋以来，书法、绘画比较发达，表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有对于音乐的评论，也把书法、绘画等艺术理论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理论中来。《文心雕龙》研究文采的美，因而以“雕镂龙文”为喻，从现代的角度看起来，《文心雕龙》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属于美学范畴。然而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毕竟不同于西方的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的鼻祖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中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史诗和戏剧，因而一开头就离不开人物形象。罗马时代讲究演说，西方的古典文学理论和修辞学，有一部分是从演说术中总结出来的。我们今天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心雕龙》，不能不和西方的美学对照，却不能生硬地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和名词概念来套。我们要像清朝的汉学家研究经书那样，对于《文心雕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利用校勘学、训诂学的方法，弄清它的含义；对于其中每一个典故都要弄清它的来源，弄清刘勰是怎样运用自如的；并且根据六朝的具体环境和时代思潮，判明它应该指的是什么。这样对于《文心雕龙》的理解才有比较可靠的基础。同时，我们不仅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也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不能仅限于字句的理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近些年来，《文心雕龙》已成显学，研究论文层见叠出，大量涌现，出版的注释、翻译、专门论著以及介绍《文心雕龙》的通俗读物也不在少数。研究人员各抒己见，真正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有的意见分歧，已经达到了针锋相对的程度。问题愈辩而愈明，从发

展学术来说，这自然是好事。但是有些文章和论著，对同一问题的解说，往往各执一辞；有的甚至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刘勰身上，多空论而少实证。笔者写这部书的方法，是要把《文心雕龙》的每字每句，以及各篇中引用的出处和典故，都详细研究，以探索其中句义的来源。上自经传子史，以至汉晋以来文论，凡是有关的，大都详加搜考。其次是参照本书各篇，展转互证。再其次是引用刘勰同时人的见解，以比较论点的异同。再就是比附唐宋以后文评诗话，以为参证之资。对于近人和当代学者的解释，也择善而从，间有驳正。从已经发表的各家注解和译文来看，对原文的理解出入很大，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文心雕龙》现存最早的板刻是元至正刊本，其中错简很多，不宜作为底本。原著经过明人校订，到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简称“黄注”）出，会粹各家校语和注释，成为一部最通行的刊本。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简称“范注”）就是以黄注本为底本，而又附录了铃木虎雄、赵万里、孙蜀丞诸家校语的。抗日战争发生后，杨明照在郭绍虞、张孟劬指导下，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写出毕业论文《文心雕龙研究》，一九五八年删订出版，取名为《文心雕龙校注》。王利器在这部书稿的基础上，于校勘方面加以扩大，写成《文心雕龙新书》，一九八〇年修订出版，改名《文心雕龙校证》（简称“校证”）。杨明照又增订了原书，取名为《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简称“校注”），于一九八二年出版。杨、王二家所校各本，笔者大都进行覆核，写成《文心雕龙板本叙录》，列于本书卷首。本书原文即以《校证》为底本。于覆校有异文时，特为标出，间或校改其明显讹字。《校证》《校注》二书所列各本校语，用词不尽一致，例如《校注》所称弘治本，《校证》称为冯本，因其与冯舒校本（亦称“冯校”）易于混淆，还是称弘治本为妥。此外梅本有初刻与第六次校定本之异，《校证》分别称为“梅本”与“梅六次本”，《校注》则称为“万历梅本”和“天启梅本”，其实是一样的。《文心雕龙训故》，《校证》称为王惟俭本，《校注》则称为“训故本”，也是一样的。在此特加说明，以资识别。《校证》《校注》所作校语，本书并未全部罗

列，惟在《校证》对黄注本进行校改的地方，则一一引述。杨、王二家间有失校处，则予以补充。二家校语与原本不符时，也予指正。对范、杨、王以及各家校语有不同意见时，则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有时也两存其说。校语往往牵涉文义，单独标出，易与注解割裂，故一律列入义证之中，不别出校记。

本书带有会注性质。《文心雕龙》最早的宋辛处信注已经失传。王应麟《玉海》《困学纪闻》中所引《文心雕龙》原文附有注解。虽然这些注解非常简略，本书也予以引述，以征见宋人旧注的面貌。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大多采录明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简称“梅注”）、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简称“训故”）。明人注本目前比较难得，王惟俭《训故》尤为罕见。兹为保存旧注，凡是梅本和《训故》征引无误的注解，大都照录明人旧注，只有黄本新加的注才称“黄注”。无论梅注、《训故》和黄注，原来大都不注篇目，则一一标明篇名或卷数，以便检索。

辛亥革命以来，在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始于刘师培，黄侃继之。刘师培未发讲义，当年罗常培先生曾用速记法作了记录，整理出来，发表的只有两篇，取名《左盦文论》，见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编的《国文月刊》。黄侃在讲授过程中写了《文心雕龙札记》（简称《札记》），虽然没有编完，但是极见功力，本书多加采录。范文澜从黄侃受业，先编成《文心雕龙讲疏》，后改写为《文心雕龙注》，成为在注释方面贡献最大的一部。五十多年来，《文心雕龙》研究者大都以这部书为依据，来进行探索。范注征引虽博，但有时释事而忘义。范注引书虽注篇名，而引文与原书每有出入。本书对这些引文都一一核对，引文有误处按原著校改，删节而未加删节号处则仍其旧。范注引述的古代作品达四百多篇，占了全书很大一部分。这些作品如屈原《离骚》、陆机《文赋》之类，篇幅既长，全文引述也不能说明问题，而且这些资料也不难得，以故本书大都删削，只征引其中和刘勰论点可以互相印证的段落。为了证实刘勰对某一作家作品的评论，本书有时采录他人的评语作为参证。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简称《校释》），因所据板本较少，校勘方面无多创获，但在释义方面每有

卓见。本书也时有引录。

本书取材较广，对于近代各种资料，无论听课笔记，残篇断简，已刊未刊，笔者本着片善不遗的精神，多有采撷。对于当代各家注释、译文和专著、论文，笔者也广泛收集，力求吸取新解。台湾近三十年来，研究《文心雕龙》成果显著，因此类书籍在大陆不经见，故多有引录。香港所出《文心雕龙》研究著作为数不多，但有的甚见功力，故亦有所摘录。施友忠英文译本第二版第三版，亦曾详加参照，但征引不多。日本学者的译著和论文，所引仅以用汉文写成或有汉语译文者为限。

当代著述，笔者认为可资发明《文心》含义者，多径录原文，注明出处。各家所引古书资料，本书注明转引。有时笔者原稿已有引文，而他人已先我发表，也说明已见某书，以免“乾没”之嫌。各家注释雷同之处甚多，引证则取其最先发表者。两人合著之书，其中某些注解显出一人之手，则予标出。如本书所引“牟注”，均见陆侃如、牟世金合编《文心雕龙译注》。所以这样标，是因为这些条注解出现在陆先生故后。但是台湾著作，如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与其弟子黄春贵《文心雕龙之创作论》及沈谦《文心雕龙批评论发微》亦多有雷同处，则不知这些地方是谁最先提出的见解。

对于那些原文不易理解，注释非常分歧的地方，笔者认为两可的，则尽量并存，提供读者参考。但多数则择善而从，间书已见。再就是本书引录的当代著作，不一定笔者都赞赏，更不一定赞成其作者之为人。本书重在注释和解说的准确性，本着不以人废言的精神，偶见确解，虽一鳞半爪，摘录不遗。台湾学者的著作，在字句解释上有些可取处，但由于保守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加上有人不敢逾黄侃《札记》雷池一步，对《文心雕龙》整体的理解是缺少发展眼光的。

本书征引资料纷繁，注解部分如置于篇末或每段之后，因条数较多，来回翻检，阅读不便。故于每段中又分成若干小节，使原文与注解保持在同一或相邻的页面上，以省翻检之劳。又为加深读者对原文的总的理解，各篇都标明段落大意。对各篇篇目也作了题解。

全书以论证原著本义为主，也具有集解的性质，意在兼采众家之

长，而不是突出个人的一得之见，使读者手此一编，可以看出历代对《文心雕龙》研究的成果，也可以看出近代和当代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有哪些创获。至于笔者解说《文心雕龙》的态度，则是大体依照刘勰写这部书的宗旨：“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篇）笔者觉得这样才能给一般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谨严的读本，以便读者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书编写的总原则是“无征不信”。笔者希望能比较实事求是地按照《文心雕龙》原书的本来面目，发现其中有哪些理论是古今中外很少触及的东西；例如刘勰的风格学，就是具有民族特点的文艺理论，对于促进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克服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会起一定的作用。这样来研究《文心雕龙》，可以帮助建立民族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以指导今日的写作和文学创作，并作为当代文学评论的借鉴。

詹 锼

一九八六年二月于天津

《文心雕龙》板本叙录

《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可是由于古本失传，需要我们对现存的各种版本进行细致的校勘和研究，纠正其中的许多错简，才能使我们对《文心雕龙》中讲的问题，得到比较正确的理解。现在就把多年来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济南所见的各种版本和抄校本加以介绍，希望能引起《文心雕龙》研究者的注意。

《宋史·艺文志》载辛处信《文心雕龙注》十卷。这部书久已亡佚，明清两代文献中，都没有征引过。今存各种板本中，元刻本就是最早的了。

一、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刊本《文心雕龙》十卷

结一庐藏书，今藏上海图书馆，二册。

卷首为钱惟善《文心雕龙序》，序题下方有“安乐堂藏书记”印和“明善堂览书画印记”。从这两颗印章说明这个本子在清代曾经怡亲王收藏。根据《藏书纪事诗》卷四第一百九十三页，“安乐堂印”“明善堂印”都是怡亲王藏书的印记。

钱序中说：

嘉兴郡守（郡守二字原文模糊不清，兹据明徐燊校本补）刘侯贞家多藏书，其书皆先御史节斋先生手录。侯欲广其传，思与学者共之，刊梓郡庠，令余叙其首。……余尝职教于其地而目击者，故不敢辞。……侯可谓能世其家学者，故乐为之序。至正十五年龙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钱惟善序。

可见这个本子是乙未年嘉兴知府刘贞刻的。序文下注“雪川杨清之刊”。

其次为“文心雕龙目录”，下有“徐乃昌读”印。正文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其款式为：

文心雕龙卷一

梁通事舍人刘 颢彦和述

原道第一

线口本。板心有的注“谢茂刊”，有的注“杨清刊”。

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十载《文心雕龙》跋语说：

顷郡中张青芝家书籍散出，中有青芝临（何）义门先生校本，首载钱（惟善）序一篇，亦属钞补，爰录诸卷端素纸，行款用墨笔识之。噫！阮华山之宋本不可见，即元刊亦无从问津，徒赖此校本留传，言人人殊。……聊著于此，以见古刻无传，临校全不足信有如此者。甲子（1804年）十一月六日，菟翁记。

的确临校本是不能全信的，即如北京图书馆藏传校元本《文心雕龙》（底本是广东朱墨套印纪评本）注明：“元至正嘉兴郡学刊本，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而我经眼的元至正嘉兴刊本却是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

《尧圃藏书题识》卷十又载：“戊辰（1808）三月，得元刻本校正，并记行款。”

傅增湘《徐兴公校〈文心雕龙〉跋》中说：

《文心雕龙》一书，……传世乃少善本，阮华山之宋槧，自钱功甫一见后，踪迹遂隐。即黄尧圃所得之元至正嘉禾（嘉兴）本，后此亦不知何往。……辛巳（1941）五月十九日藏园识。

以傅增湘这样的藏书家和校勘学家，都不知道元至正刻本《文心雕龙》的下落。现在上海图书馆藏的元刻本，可能和黄丕烈的藏本不是一个来源。总之，这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刻本。

这个本子的《隐秀》篇，自“而澜表方圆”句后有缺文，下接“朔风动秋草”，中间脱四百字。元刻本每半叶二百字，看来是整缺一板。又《序志》篇在“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的“梦”字以下有缺文，下接“观澜而索源”，中间脱三百二十二字。

这个本子是许多明刻本的祖本。范文澜《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中都说没有见过这一刻本，可见是稀世之珍。但是它有两处大的脱漏，其它错简的地方也很多。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今存最早的刻本，就忽略了其中的许多错简。这是我们必须细心校勘的。

二、明弘治十七年冯允中刻活字本《文心雕龙》十卷

北京图书馆藏，分订四册。卷首有《重刊文心雕龙序》。序中说：

余素粗知嗜文，每览是书，辄爱玩不忍释。然惜其摹印脱略，读则有叹。兹奉命至江南，巡历之暇，偶闻都进士玄敬，家藏善本，用假是正，既慰夙愿矣。……惟是石渠具草之用，皂囊封事之作，以迨后彦而备时需者，不可一日缺。则是编能无益乎！此予捐廉而行之者，盖有以也。……弘治十七年岁在甲子四月上浣日，文林郎监察御史郴阳冯允中书于姑苏行台之涵清亭。

正文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其款式为：

文心雕龙卷第一

梁通事舍人刘 綎

《隐秀》篇和《序志》篇缺文和元至正刻本同。卷第十末刻“吴人杨凤缙写”。最后有都穆跋。跋语说：

梁刘勰《文心雕龙》十卷，元至正间尝刻于嘉兴郡学，历岁既久，板亦漫灭。弘治甲子，监察御史郴阳冯公出按吴中，谓其有益于文章家，而世不多见，为重刻以传。……吴人都穆识。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十一元版集部：

《文心雕龙》一函八册，书末刻吴人杨凤缙写。元赵孟頫、虞集，明徐有贞、吴宽，本朝耿藩递藏，余无考。

后面抄录了大量的藏书印。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人刻书载写书生姓名”条说：“《天禄琳琅》后编十一元版（此以明版误作元版）《文心雕龙》十卷，末刻吴人杨凤缙写。”一九三四年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善本书目》也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十一的元版《文心雕龙》一函八册改列为明刻本。这个本子的卷末正是刻了“吴人杨凤缙写”，可见清故宫所收的和这是一个板刻。《天禄琳琅书目》所载的那些“虞集家藏”等等藏书印，都是后人伪造的。这个本子则只有今人周叔弢的“曾在周叔弢处”方印一块，就不知道是怎样流传来的了。

三、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一元 私淑轩刻本《文心雕龙》十卷

北京大学藏。北京图书馆藏一本有清褚德仪校。卷首有方元祯序，据此知道这个本子是汪一元嘉靖庚子刻于新安的。正文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板心上方有“私淑轩”三字。其款式为：

文心雕龙卷之一

梁通事舍人刘 勰撰 明歙汪一元校

按此本从弘治本出，而略有增改。《隐秀》篇、《序志》篇缺文与元至正本同。

四、徐燊校汪一元私淑轩刻本

北京大学藏，分订三册。卷前有加页一纸，抄《福州府志》，记徐燊、徐延寿、徐鍾震三代履历：

徐燊，字惟起，闽县人，博学工文，与兄燊齐名。善草隶书，诗歌婉丽。万历间，与曹学佺狎主闽中词盟，后进皆称兴公诗派。性嗜古，聚书万卷，居鳌峰麓，环堵萧然，而牙签四围，缥緜之富，卿侯不能敌也。其考据精核。自乐府歌行及近体无所不备。著有《徐氏笔精》《榕阴新检》《红雨楼集》《鳌峰集》。子延寿，字存永，词赋激昂，有《尺木堂稿》。孙鍾震，字器之，有《雪樵集》。

卷首载徐燊崇祯己卯（1639年）题记说：

此本吾辛丑年（1601年）校雠极详，梅子庾刻于金陵，列吾姓名于前，不忘所自也。后吾得金陵善本，遂舍此少观。前序八篇，半出吾抄录，半乃汝父（指延寿）手书，又金陵刻之未收者。……崇祯己卯中秋书付鍾震。

眉上小字是吾所书，间有谢伯元注者，伯元看书甚细耳。

以下抄录《梁书·刘勰传》，下注“《南史》有传稍略”。然后是手抄的各种板本的序七篇：